

当代诠释学的发展与中国借鉴述评^{*}

亓光

【提要】诠释学是关于人的理解问题的哲学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当代诠释学分两个阶段逐渐完成了从一般解释学向存在诠释学和实践诠释学的转向,极大地影响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发展中的当代诠释学具有明显的语言转向痕迹,秉持了历史主义的许多特质,应承了实践哲学的发展研究,实现了跨学科的长足进步。对于中国诠释学研究而言,当代诠释学的发展在其理论建构、方法选择、论题领域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诠释学 当代社会科学 语言转向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5-0019-06

一、诠释学的当代发展

当代诠释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及其相关普遍性的应用是政治诠释学的主要理论来源。20世纪,“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①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是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要人物。他们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②这意味着诠释学已经超出存在论的范畴,成为一种存在性的实践智慧(*phronesis*)。在一定意义上,20世纪的诠释学不但完成了从作为工具的一般解释学向作为本体的哲学诠释学的转型,而且实现了存在论诠释学向存在性实践诠释学的转型。

正是后一种转型包容诠释学内部的不同典范,与分析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美学实现了广泛的融合,“摆脱了诸多固有标准的局限,并且开始将社会研究中相关的有联系的观

点的不同特质联系起来”,^③使得诠释学成为解释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这一过程大致可以从两个阶段加以说明。

第一个阶段,20世纪的60、70年代,为诠释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巨著《真理与方法》出版之后,诠释学一跃成为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新星。与每一部伟大著作产生的“水晕效应”一样,该著作使人们开始关注诠释学的历史,将其“擦拭一新”,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0AZZ001)。

①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前言第1页。

②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2~553页。

③ Frank C. Richardson and Blaine J. Fowers,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n Overview* [A], Edited by Mark Bevir, *Interpretive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 Ltd, 2010. 32.

同时引发了关于诠释学本身的许多争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争论不仅梳理和重塑了诠释学的传统，而且为其后的诠释学融合趋势奠定了基础。

这些争论带来了三种主要的诠释学理论模式，即重建浪漫主义的诠释学传统，以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的一般诠释学为主要理论来源；存在主义的诠释学典范，以布尔特曼（R. Bultmann）和早期海德格尔为主要理论来源；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①

第二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诠释学普遍化时期。与上一阶段相比，诠释学的受关注度有所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诠释学家却发现了发展诠释学的新机遇，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这种现象符合真正的“解放性反思”。^②与上一个阶段不同的是，这些“反思”的争论更加集中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主要体现为三个基本方向。第一，以帕尼博格、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为代表的元批判的诠释学，对哲学诠释学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进行基础性批判的评价性反思；第二，以菲什（Fish）、罗蒂为代表的社会实用主义的诠释学，发展了哲学诠释学重视历史传统、语言中心主义的理论维度，“认为对每一个文本或者历史语言的理解都不同于其前或其后文本或语言，因此，真理是和语境相关的，知识和真理只存在于不断变动的历史当中，解释者或哲学家总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当中”；^③第三，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的诠释学，提出了“社会旨趣”^④这一概念，要求哲学诠释学需要明确它存在时的“社会旨趣”，应该在其实践化的过程中对其核心预设有所让步，即不再仅仅针对文本，不能过分信任“成见和传统”，应从寻求沟通的规范和解放性反思的角度实现批判的“社会旨趣”。

由此可见，当代诠释学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带有明显的语言转向。诠释学，特别是哲学诠释学及其追随者，是20世纪哲学语言转向的重要流派，它之所以可以与分析哲学从分庭抗礼最终走向兼容并包，二者都十分注重语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诠释学的语言转向根源于“从作为工具的一般解释学向作为本

体的哲学诠释学的转型”，具体而言，主要是“源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学摒弃了理解主体意向性即文本作者意图的问题，而倾向于将文本语言看做一种自主性的媒介和意义的源泉。”^⑤诠释学语言转向的主要命题突出，认为理解的本身、对象、过程和结果都是语言性的，即理解是语言的存在、对语言的观察、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描述的有机综合；同时，语言不仅不是一种工具，它更是而且应该是一种与人的“存在”或“共在”相一致的理解境遇，换言之，语言就是世界观，是人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基础。由此规定了人如何进入生活世界，并通过对人的语言认知和语言表达的有限性限制——即“巴别塔问题”——构建了概念的多样性和理解的非同一性，为不断寻求彼此认同、集体共识和社会团结的历史实践提供了内在逻辑和外在形式的双重规定性。经过语言转向的诠释学，告诉人们“理解不再是对文本的外在解释，而是人的此在本身，诠释学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界的阐释”，^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称得上哲学诠释学或当代意义上的诠释学。

其二，秉持历史主义的特征。历史观是以哲学诠释学为代表的当代诠释学的共同核心范畴。从根本上说，当代诠释学都自觉地与知识论传统中的一切历史观划清界限。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

① Anthony C.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p. 10-11.

② 真正的解放性反思是具体和辩证的，伽达默尔认为具体的和辩证的“解放性反思”应该警惕这样一种实现了的反思观念，即“在这种观念中使社会从经常的接访过程中——社会在这种过程中摆脱传统的束缚而构成新的联系的有效性——提升到一种最终的、自由和合理的自我占有，……”（参见《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93页）

③ Anthony C. Thiselton,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2, pp. 10-11.

④ 简而言之，社会旨趣是一种作为基础性的社会伦理观，主张语言、文本、传统的偶然性、有限性不再是理解的普遍基础，而是超越语境历史性和有限性的社会（或者沟通）伦理观，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基础。

⑤ 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⑥ 《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前言”第28页。

等的历史主义代表了当代诠释学历史主义特征的基本面。^①在这个基本共识上，不同的历史观带来诠释学的内部分殊。海德格尔的存在诠释学其基础在于“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离不开“成见”和“前理解”，即便是批判“传统”的哈贝马斯也承认历史的判断和成见对理解的巨大影响力。保罗·利科曾将诠释学的历史观概括为“一种历史，三种解释”。一种历史是指：历史的意义只能是“作为时间存在的人的存在”的历史；三种解释则是指或从历史进化的抽象层次上解释历史，或从存在的层面上理解历史，又或从信仰和愿望的层面上解释历史。^②显然，诠释学的历史主义是从人的理解本身的有限性出发形成的、以时间发展线索上的无限性为基础的，这就超越了启蒙传统下知识论对历史的占有或把握的独断性。它表明：只有历史的意义保持着模糊性和开放性，历史才成为历史。^③而“解释历史是一种人的自我发现活动，这种活动与人发现他的历史是重合在一起的。”^④

其三，符合实践哲学的要求。当代诠释学的历史主义特征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对它的质疑同样不绝于耳，尤其是对这种历史观发展成为相对主义的担忧十分强烈。面对质疑，诠释学选择了实践智慧，成为实践哲学。伽达默尔敏锐地从古代释义学的实践性中发现了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同构性。首先，与诠释学合构的实践哲学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传统，即“实践就是实践事情的全部，包括一切人行为和人在世界中的自我安排，政治和立法也属于这个范围”。^⑤其次，与诠释学相容的实践哲学，并不是可知性思想支配的规定性科学，即不是将理论转化为“生产技术”、“产品”及具有类似属性的认知的过程模式。再次，诠释学不仅恢复了实践哲学的传统，而且有所突破。它使得实践哲学具备了一种特别的“合法性”，“这种实践的科学必须和人类生活中包容一切的善的问题打交道，……（且）并不打算利用某种宇宙论的、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关于实践问题的论证。……（它）并不能完全放弃那种不仅要认识，而且本身就要有实际作用的要求，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生活中善的科

学’本身就要求促进这种善。”^⑥最后，诠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同构既是交互的，又是包容的。诠释学强调且系统地阐释了理解问题，而理解是一种工具也罢，或是一个原初存在也罢，它都是实践行为。诠释学对理解问题的强化在不自觉中加快了实践哲学的发展速度，唤醒了实践哲学的普遍意义。与此同时，正因为理解行为是实践行为的一种，那么这种方向性一致有利于诠释学丰富自身意涵，其目的仍在于塑造诠释学的普遍性和基础性地位，符合“从方法论问题回到实质性问题”^⑦的描述。至于诠释学与实践哲学融合能够发生的作用，除了确立人文科学之独立地位外，还彰显了一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一种“坚持”与“努力”的研究态度，召唤人们不断尝试去理解“最熟悉之物”。

其四，具有跨学科性。当代诠释学的跨学科属性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并不是在与自然科学的分殊中独善其身，而是积极要求自然科学具备诠释学的合法性，“正如不可能存在抽象孤立意义上的历史问题或历史事实一样，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况也是如此。”^⑧（2）“关于诠释学的谈话首先分布在四个学科领域，即法学诠释学、神学诠释学、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

① 伽达默尔指出，“历史经验，按照狄尔泰所给予的基本意义，既不是一种程序，也不是一种无名称的方法。的确我们可以从它推导一般的经验规则，但是，它的方法论却不具有可以明确概括一切正发生事情的规则知识的价值。经验规则其实需要使用它们的经验，并且基本上只在这种使用中才是它们所是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承认，精神科学的知识并不是归纳科学的知识，而是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种类的客观性，并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获得。”（参见《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345页。）

② 对第三个取向，略加解释。所谓从信仰和愿望的层面上解释历史，实际上体现了神秘主义的历史观，即由信仰来理解历史并给予历史以意义，让人的历史在希望中超越自身，进入另一个有信仰而来的神的历史。

③ 转引自殷鼎《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90页。

④ 《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第290页。

⑤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28页。

⑥ 《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382页。

⑦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7页。

⑧ 《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第578页。

逻辑”，而作为实践哲学本身的要求而言，政治学、伦理学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它们就是“实践哲学”的表现，或狭义的实践哲学。这说明，“诠释学谈话”具有广泛的多学科基础。(3) 诠释学的跨学科性依赖于恢复“语言的权力”，即语言是实现上述两个特征的方法论根基。这种方法论经过利科的“精神分析方法”的改造，扬弃了语言中心主义的“文本崇拜”，“语言”的多种类型，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理解的不同领域。

二、当代诠释学与中国的借鉴

据有的学者回忆，“大约从1978年开始，我国学者首先通过德国和日本的一些哲学译文接触到了当代西方诠释学（原文为‘解释学’）。随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全面展开，我国研究者不久开始直接研究德、法、美诸国的有关专著，几年之后，诠释学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拥有越来越多研究者的专门研究领域了。”^① 客观而言，诠释学在哲学传统、内在逻辑和话语体系等方面仍位于西方哲学的主流之内。特别是诠释学的学科、流派、时代和地域等基础广泛，这是它在当代获得新发展的有利条件。不过，当代诠释学在中国的发展仍比较有限，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语言学之外的领域使用率偏低。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界定——“诠释学（解释学）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等人文学科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等问题的哲学系统、方法理论和技术性规范的统称”。与这一描述相比，现实的诠释学在宏观层面上尚缺乏“狭义和广义、中心与边缘”相对关系的论证，在中观层面上也明显缺乏对政治学、伦理学等实践哲学的关注和应用，而在微观层面上概念作为伽达默尔式的语言中心主义和利科式的语言中心主义的综合作用的产物的价值还没有被很好地挖掘。由此可见，诠释学在中国仍有广阔天地，“首先，作为当代西方重要的哲学流派，它应成为我们专门深入研究的对象。其次，作为有关意义和解释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它将涉及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许多学科，从而成为我们有关人文科学方法论总体研究的组成部

分。最后，在我们整理和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理解的工作中，它将提供有效的方法论手段。”^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诠释学需要也应该获得更加广泛的研究和运用。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介绍诠释学中国化的研究情况：“西方哲学研究界关于西方诠释学的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研究界关于诠释学与中国经典注释结合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实践诠释学的研究以及探讨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问题；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③

首先，在介绍西方诠释学的研究方面，我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做出了极大努力，持续译介了现、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诠释学著作，^④ 翻译了部分国外学者评介西方诠释学的专著，^⑤ 也出版一些诠释学研究的著作，^⑥ 等等。应该承认，我国的西方诠释学的介绍工作已经初见成效，相关研究也可分为几类。其一，关于西方诠释学的定位及其意义的研究，又可继续表现为对诠释学的历史流变、发展脉络、理论特征与本质

① 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② 李幼蒸：《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

③ 洪汉鼎：《诠释学与中国》，《文史哲》2003年第1期。

④ 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此书经过多次翻译）、《哲学诠释学》、《科学时代的理性》、《赞美理论》、《伽达默尔论柏拉图》、《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哲学生涯：我的回顾》、《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等，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引论》、《历史的意义》、《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的结构》等，利科的《解释学与人文科学》、《历史与真理》、《活的隐喻》、《解释的冲突》、《论公正》等，赫施的《解释的有效性》，等等；编辑出版了一些诠释学文集，如《伽达默尔集》、《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等。

⑤ 如《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哲学解释学导论》等。

⑥ 如张汝伦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解释学》，殷鼎的《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严平的《走向解释学的真理——伽达默尔哲学述评》，洪汉鼎的《理解的真理——真理与方法解读》、《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的发展》，李幼蒸的《本体与诠释》，何卫平的《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解释学之维——问题与研究》，高宣扬《利科的反思诠释学》，章启群的《意义的本体论——哲学诠释学》，陈嘉明的《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李红的《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等。

精神等方面的持续关注；其二，对西方诠释学的理论发展及其论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诠释学基本概念的厘定、诠释学历史的多维透视、诠释学的内部争论、诠释学的本质和属性的探索；其三，对西方诠释学与认识论、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四，对西方诠释学与伦理学、宗教学、修辞学、分析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比较研究，特别是在关注“实践诠释学”的同时，逐步思考扩大诠释学应用范围的探索。

其次，“中国哲学研究学者试图运用西方诠释学的观念与方法，重构我国自己的诠释学传统，以完成传统注释理论的当代转化”^① 相关方面的研究。^② 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基础在于尊重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的诠释特征，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为此与西方诠释学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型的过程相契合。主要提出并着力解决了对创建中国诠释学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如中国诠释学的合法性及其正名问题、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发展脉络及其特点问题、中国经典诠释个案分析问题等，并从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理论、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方法、诠释学与儒、墨、道、法、佛教等学派的关系、中外哲学比较与相互诠释等方面开展了多角度的学术研究。^③ 汤一介先生指出“中国的‘解释问题’可能有比西方更长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一套自己成体系的‘解释问题’的理论。同样，中国的‘解释问题’也不限于对经典的‘解释’，但较之西方，中国的传统似乎更重视经典的解释。当然中国在‘解释问题’上也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的，而且往往与当时哲学潮流相配合，甚至在同一时期会有对同一经典的不同解释的派别。……我们只有在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有充分了解后，才有可能讨论能否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④ 这说明提出和构建中国诠释学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再次，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的实践诠释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当代诠释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对诠释学的重视来源于诠释学的实践性，诠释学作为

哲学，就是实践哲学。”^⑤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诠释学的关注及其马克思主义诠释学的创建性研究是中国诠释学研究对西方诠释学典范开始进行批判性汲取和语境性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相关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第一，以诠释学的视野、思维和方法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希望能够获得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

① 洪汉鼎：《诠释学与中国》，《文史哲》2003年第1期。

② 如，汤一介先生的《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刘笑敢的《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景海峰的《中国哲学的诠释学境遇及其维度》，魏长宝的《经典诠释学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唐国军的《诠释学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论——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系列论文7篇），陶东风的《建构中国自己的文学解释学》，刘耘华的《诠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论语〉、〈孟子〉、〈荀子〉对古代传统的解释》，李清良的《中国阐释学》，等等。

③ 参见陈治国与洪汉鼎的年度性研究综述系类中的相关概括，包括：《2009~2010：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2008：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2007：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2006：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2005：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2004：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2003：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 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⑤ 洪汉鼎：《诠释学与中国》，《文史哲》2003年第1期。

⑥ 如朱士群的《现代释义学原理及其合理重建》，潘德荣的《现代诠释学及其重建之我见》，俞吾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诠释学》和《实践诠释学》，何伟平的《通向诠释学之途》，杨学功的《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倾向》，张一兵、胡大平的《“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学’转向”》，张文喜的《论“回到马克思”的解释学张力》，赵天成、李娟芬的《马克思的幽灵与现实：运用当代阐释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解读》，皮家胜的《解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新维度》、《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金福、陈海飞的《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化——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诠释学”理解》，胡潇的《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陈海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解释学审视》，吴学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等等。

观的新发现,或者对以往认识不足、不够重视甚至错误认知的相关论断进行重释,这主要体现在“走近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的争论中。第二,以诠释学改造马克思主义,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学,即运用诠释学理论和术语所作的明确界定,正确地提出相关诠释性问题,围绕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种诠释气质。第三,诠释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即以一定的研究主题或者二者共同的研究领域为对象,将各个诠释学家的论断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突出二者的相对独立性,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第四,实践诠释学的发展与深化,换言之,马克思哲学是实践诠释学,而且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其既需要不断正视和克服诠释学困境,又需要积极筹划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并以此实现实践诠释学作为反思一般哲学理论之基础的时代价值。^①

最后,人文社会科学与诠释学的相关研究。诠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涉及到文学、法学、美学、宗教学、历史学、伦理学、传播学、自然科学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这些研究不仅显示并反映了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与现实性,而且在相当意义上深化、推进了诠释学

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诠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和渗透,逐渐从学科相似性走向学科跨度性,如从文学走向法学、自然科学;从方法输出趋向视域介入,即从在其他学科的核心范畴和对象领域内应用诠释学工具逐渐试图在诠释学的整体视域——历史、语言、存在和应用——中进行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解和知识构建;从单纯输出到辅助构建,即从单纯将诠释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介到其他学科之中转向支持其他学科建构自身的诠释框架体系,并根据相应构建中的新问题完成自身的不断改造——即实践性应用。事实表明,诠释学已在中国生根发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本文作者:政治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参见俞吾金《实践诠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② 陈治国、洪汉鼎:《2003:诠释学与中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and its Reference to China: A Brief Overview

Qi Guang

Abstract: Hermeneutics is 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understanding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as developed from the general hermeneutics to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practical hermeneutics by two important stages, which greatly influences the expans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as obvious traces of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 which upholds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ism, promises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gradually achiev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t the same time,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theory, the choice of method and subject area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linguistic transformation